

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系统论方法既是计量,前面谈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系统论的方法比经济史的研究进步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

吴老把方法的创新看得十分重。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变化则是西方的冲击引起的,即所谓“西欧中心论”和“冲击—回应”范式。近二三十年,兴起了反对这种观点的思潮,并渐形成巨流。吴老对此十分重视。

在吴老去世周年之际,重新学习与回顾他多年为振兴经济史学科对方法论的研究和谆谆教导,令人产生新的受益与感悟。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得到迅速普及和传播,对于中国向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萌起,发挥了促进作用。相对而言,中国和外国经济史研究要冷清和滞后许多。30余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要求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问世并领航中国经济时,中外经济史教学与研究滞后的问题就逐渐凸现了。经济史与经济学存在着“源”与“流”的辩证关系。今天我们对经济史上的许多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还需要作专题、阶段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传统的方法,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仍是第一位的。动态的研究,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单靠逻辑思维或计算机给出答案,要有文献的证明。近年来,一批经济史研究人员为了弥补史料、文献的不足,作了大量艰苦的基础工作,但与深入研究的需求比较,还很不够。不仅如此,对于已经发掘的史料,研究也很不足。在新的形势下,吴老提出的“史无定法”的包容理念,不仅为经济史研究开辟航道,打开思路,促进经济史研究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而且启示我等后学者,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多么有趣、多么广阔的天地,有大量尚待开垦的荒垣,可以从各个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手段进入,取此法之长,补它法之短,通过不懈努力,定能收获硕果。

我们将努力开拓耕耘,以新的成果告慰吴老!

良师难遇

——回忆吴承明先生

李伯重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缘分。荀子说“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一个人能够遇到好老师,是他一辈子的福气。然而这种福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正如佛家所云:世间万物皆因缘而生,因缘聚则物在,因缘散则物灭。我本人在读书和工作时,有幸得到多位良师的指导,因此我是非常有福之人。在这些老师中,吴承明先生是给我指导最多、帮助最大者之一,他和我的师生情谊已有三十余年之久。

我很早就对经济史感兴趣。1978年考到厦门大学,就是专门投韩国磐先生门下攻读隋唐五代经济史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家父李埏先生指导下读了一些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在1980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没有西方经济史理论和经济史研究著作可读,因此我在“文革”中开始学习经济史时,能够读到的只是1950年代翻译出版一些苏联学者写的经济史学理论著作,如梅伊曼和斯卡兹金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波尔什涅夫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读这些书时,我写了不少札记和读书心得。到了厦大后,正值经济改革开始之时,经济学界对我国的个体经济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涤新先生是我国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之一。改革开放开始后,他首先提出对于个体经济,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农民,要既肯定了他们是公社的社员,即集体经济中的成员,

又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鼓励多种经营,发展家庭副业,承认他们是具有个体经济性质的经营者。许先生的观点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于是把原来的札记和读书心得整理成《封建社会中的个体经济与共同体经济》一文,寄给许先生,请他赐教^①。1979年,厦大经济系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会议。我忽然接到经济系一位老师转来的口信,说参加会议的吴承明先生要见我。我从未见过吴先生,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②,于是匆匆去到会场所去拜谒。到了那里,在会议间隙时间,见到了吴先生。因为时间紧,他只是很简要地说“你寄给许先生的文章,许先生读了,感到很高兴,并转给了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朱家桢先生。朱先生读后觉得有价值,因此请我就开会之便,在厦大见你,并转达朱先生希望你毕业后去该研究室工作之意”。我听后感到非常振奋,感谢了许、朱先生的盛意,随后向吴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请吴先生予以指导。但因吴先生这次来开会时间很紧,无法多谈,因此他叫我以后有机会来北京再详谈。这次见面,就是我初识吴先生。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这样一位大学者,待人却如此谦和,对后辈完全没有架子,因此决心一定要找机会到北京去求教吴先生。

1979年暑假,我和师兄杨际平到北京去看书,为硕士论文收集资料。到北京后不久,我即去东大桥路吴先生寓所拜见他。到了吴府,只见房间狭窄,光线晦暗,家具简陋。由于空间太小,家中仅有一张书桌,堆满书刊和文稿。吴先生的许多著作,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在昏暗的光线下写成的。那时吴师母已中风多时,生活不能自理,虽然请了保姆,但是吴师母的生活起居,都是吴先生亲手料理,不要他人插手。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却不见吴先生有何不悦之色,谈起学问,依然侃侃而言,丝毫没有怨言。我心里不禁深深感叹:像吴先生这样的国际著名学者,真是像孔子赞颜回所说的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感觉,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语,其吴先生之谓歟?

在这间陋室中,吴先生和我谈起如何做经济史。他说“做经济史,必须要对经济学有较好的理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在方法上要进行数量分析,在研究对象上则要研究GDP等问题。政治经济学只是经济学中的一种,要研究经济史,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经济史,只学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是远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经济学”。他还说“由于多年的封闭,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国内的做法和国外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你应当多读些国外学者做的经济史研究著作,特别是读原文”。这些话,对我震动很大。我请他推荐几本国外的书,他当即推荐了柏金斯(Dwight Perkins)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和伊懋可(Mark Elvin)的《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他说:前一本书是经济学家写的中国经济史,而后一本书则是历史学家写的中国经济史,两者各有千秋,都应当认真阅读,从而了解西方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听了吴先生的话,我即去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查阅,找到了后一书。由于当时没有复印机,更没有数码相机,因此我只得一边阅读,一边随手译为中文^③。由于时间有限,我仅将该书第三编做完。当时这两部书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中无法找到。我后来对家父谈起此书,他即记在心里。1980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来昆明,为他的西南联大研究收集资料。他采访了家父。交谈中,家父谈到了此二书。易氏回

^① 此文后来以《论封建社会中的个体经济》为题,刊于《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② 吴先生与家父在抗战时期都在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曾有两年的同学之谊。毕业后,吴先生去了美国,遂断了联系。到了解放后,吴先生被安排到中央外资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主要从事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工作,与家父在研究方面的联系不多,加之他们各自在北京、昆明,相距遥远,因此竟然是数十年未能相见。到了“文革”之后,吴先生关于经济史的文章不断刊出,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家父在昆明也读到了一些,深为赞赏,告诉我要特别注意学习。因此虽然一直没有机会拜识吴先生,但我对吴先生的学问早已“心向往之”了。

^③ 这些译文,后来经整理,与王湘云博士翻译的上、中两编,成为一个全译本。后来一直等伊懋可先生校阅,但他因为事冗,至今尚未完成校阅。

到美国后,对柏金斯教授说起此事,柏氏即将其书寄了一本给家父。易氏又到书店购买了一本伊懋可的书寄给家父。家父将二书都寄给我,我才得从容读完全书。这两本书是我第一次接触的西方学术著作,也是我读得最认真的西方经济史著作,对我后来的研究影响至大。

1981年冬,我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后,转到傅衣凌先生门下,攻读明清经济史博士学位。就是从这时期开始,吴先生的著作不断刊出,在经济史学界引起一阵又一阵的震动。我迫不及待地搜集他的文章,力求先睹为快。在学习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一年前对我的教诲的深意。于是我遵照他的指教,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经济学。学得越深入,对吴先生研究的特色感受越深刻。不仅如此,吴先生精深的史学功底和优美的文风,也成为我学习的样板。因此我一直私淑他,他也时常给我具体的指导。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傅衣凌师邀请吴先生来主持我的论文答辩。自此,我也得忝列吴先生之门墙。

我博士毕业后,到浙江社科院工作。1986年秋,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ing Society)决定举行一个中国经济史会议,旨在促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这个会议包括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87年初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举行,主要是经济学家对历史学家讲可以用于研究经济史的方法;第二次会议则是1988年在图桑(Tucson, Arizona)举行,由历史学家向经济学家讲可以用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会议筹备者罗斯基(Thomas Rawski)教授请吴先生推荐一位中国学者,吴先生即推荐了我。1987年1月2日,我到了夏威夷,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在这两次会议上,虽然我由于英文听力不佳,大部分发言未听懂,但是把会议上的文章带回来阅读,收获还是很大,开启了我国国际求知的过程。参加这两次会议的历史学家主要是治中国经济史的中青年学者,除我之外,还有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 Bin Wong)、濮德培(Peter Perdue)、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几位。这些学者都与吴先生有学术联系,后来都成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中坚。

1988年,多蒙黄宗智教授盛意,邀请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讲学半年。当时我在杭州因为家累重,身体又很不好,加上经济窘困,因此感到犹豫。与吴先生商量,吴先生大力鼓励我去,并且主动提出借给我三五百美元,以帮助我解决经济困难。在当时,三五百美元是一笔巨款。虽然我谢绝了他借钱给我的好意,但是我依然非常感谢他的厚爱。在他的鼓励下,我下决心去。这也开了为我日后往来太平洋教书的先河。

我后来在美国工作,1993年决定回国,但是希望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在吴先生和方行先生等前辈的指导下工作。吴、方先生为此积极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使得我终于如愿来到经济所。在经济所工作的几年中,有机会更多地拜见吴先生。

在经济所工作的5年期间,有幸和吴先生更多见面,更深入地讨论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吴先生虽然是一代宗师,但是在学术问题的探讨上却完全采取平等的态度。因此我们后辈在吴府上与吴先生可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即使是与他观点相悖的看法,也可以直言不讳,提出讨论。

1995年,在上海举行举行了一次中国经济史会议。会上我提交了一份题为《现代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论文,对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这篇文章后改名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刊出于《读书》杂志1996年第8期。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读者的热烈回应,《读书》随后发表了数篇看法各异的读者(包括黄仁宇先生)的来信,成为一时讨论的热点。

众所周知,吴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方面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研究代表了此项研究的最高水平。他读了我的文章后,和我进行了讨论,明确表示以往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事实上许多是市场问题,因此以后应当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研究,而非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他后来在学术会议上也提出了这个看法,说自己将不再使用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词汇。他的这种做法,不仅表现了他晚年思想活跃不减往昔,而且更表现了他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大智大勇,如果自己“觉今是而昨非”,那

么就不惜公开改变旧的观点。这是何等令人崇敬的学者本色啊!

我后来从社科院到了清华,仍然继续得到他的指教和关爱。每逢节日或者出国回来,都去吴府拜见吴先生,他也经常留我便饭,借以畅谈。每到那里,总见他在阅读新出的西方学术著作,手不释卷,兴趣盎然;或者是在奋力笔耕,孜孜不倦,新见叠出。他到了八十多岁高龄还学习使用电脑,不久即能上网查阅资料,并和后辈通电邮。这使我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因为这表现了他依然生气勃勃,心理上仍然年轻,充满活力。

今年六月,我从香港回北京。听说吴先生身体欠佳,于是立即去探望。彼时他已十分衰弱,但是见到我非常高兴,交谈达半个小时之久。他还想多谈,但是我怕他过劳,遂告辞而去。不意这竟是与他的最后一面。两周之后,我在上海得到噩耗,吴先生已驾鹤西去,留给我无尽的哀伤和思念。

1997年吴先生八秩大寿时,我写了一篇《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向大众介绍这位学界的传奇人物。文章中说:吴先生“本是性情中人,无论投身何种事业,都充满为追求真而献身的热情。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治学中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尽管年事已高,又经历了悼亡、丧子等人生不幸,但吴先生在精神上依然年轻,不减当年”。这就是我心中的吴先生的完整形象: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我有幸遇到这位名师,是我一生的福气。他给了我宝贵的教诲和深切的关爱,是我在学问与人生道路上的引导与动力。对他的恩德,我是永远感激不尽的。1990年代初,台湾联经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①;1998年我的英文专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完成^②。吴先生为此二书写了序言,对我多所勉励。这些序言,今天也成为他和我之间的三十余年的师生之谊的永久纪念。

与时俱进,老当益壮 ——深切怀念吴承明先生

萧国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00871)

当吴承明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的时候,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尽管吴老^③享年九十有四,是高寿的,但我依然禁不住地泪水涌泉,这是因为他的精神依然是年轻的。泪水虽然模糊了我的双眼,但是对他的怀念却如花蝶联翩,犹如电影放映在我的脑海里。

我第一次拜见吴承明先生是在1980年的春夏之交。那时吴老正在和许涤新一起负责编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编写一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来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延安,毛泽东对当时党内的学风进行了批评。他说,在研究历史方面,“言必称希腊”,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却在“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④以后他又抱怨地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⑤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

① 该书经刘翠溶教授审阅通过,并提出详细意见。但是后来拖到2002年方刊出。

② 该书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The Macmillan Press Ltd., Houndmills, England)与美国圣马丁出版公司(St. Martin's Press, Inc., New York, USA)于1998年刊出。

③ 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习惯地敬称吴承明先生为“吴老”。本文继续沿用这个尊称。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5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71页。